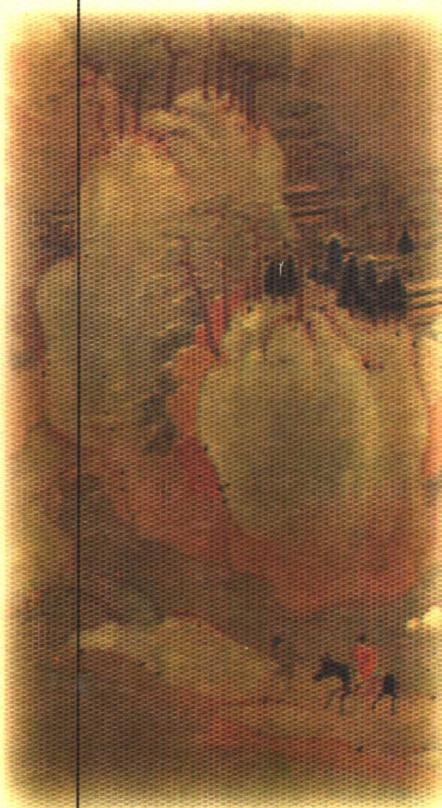




中国历代散文选注

郭预衡 主编

# 宋辽金元散文选注



林邦钧

选注

# 宋辽金元散文选注



林邦钧 选注

岳麓书社

责任编辑:鄢 珑  
封面设计:罗 丹

## 宋辽金元散文选注

郭预衡 主编

林邦钩 选注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图书馆印刷

199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20.875

字数:540,000 印数:1—5,000

ISBN7—80520—888—3  
1·423 定价:2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调换

社址:长沙市新民路10号 邮编:410006

# 总序

郭预衡

中国古代散文浩如烟海，散文选本也日渐其多，新的选本应有新的特色。以这套《历代散文选注》而言，突出的特色，是选文比较全面，从中可以窥见各个历史阶段的散文特点。

首先，先秦这个历史阶段，是古代散文第一次蓬勃发展的时期。这时周朝王纲解纽，礼崩乐坏，处士横议，诸子争鸣。百家之文，放言无惮，纵横驰骋，最有时代特征。不仅儒墨名法，互相驳辩，各家内部，也有论争。尽管这时各家各派之文，盖以“立意为宗”，不以“能文为本”（见萧统《文选序》），但实际上，也都言而有文。孔子曾说：“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”，孔门重视文采，最为明显。老子虽说“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”（《道德经》），但其书五千言，几乎都是“美言”，不能谓之“不信”。其他各家之文，包括不讲文采的墨家和法家，也都有文采可观。

先秦这个历史阶段，文史各科尚未区分，而各家行文都尚文采，这是此期文章的一大特点。

其次，汉魏六朝这个历史阶段，是古代散文发展变化、汉语文章特点更加突出的时期。

汉代初年，天下始定。萧、曹为政，以黄老为宗。法网疏阔，思想尚未一统。这时的文章作者，学杂管、商，或兼纵横。贾谊、晁错等人的文章，大抵都有先秦的遗风。

到了武帝以后，文章开始变化。这时出于政治需要，罢黜百

家，独尊儒术，这对文章的发展变化大有影响。但当武帝之世，黄老之学尚盛，儒术并未真正独尊。所以司马迁仍然能够“发愤”而写“谤书”，淮南王刘安仍然能够私集宾客而有所论著。司马相如等人作赋，也未免“虚辞滥说”。

但到元帝以后，由于儒学逐渐成为官方之学，文章乃渐染儒学之风。正是因此之故，世人论文，乃谓大汉文章，东京不如西京。

到了汉魏之际，文章又有变化。这时儒学统治动摇，异端思想输入，文苑出现了小型的百家争鸣。

首先是曹操为政，力倡“通脱”，建安诸子为文，乃有“想说什么便说什么”（鲁迅语）的新的特色。

再到魏晋之际，阮籍、嵇康，“师心”、“使气”，长篇大论，蔚为“一代鸿文”。再到晋宋之际，陶渊明“忘怀得失”，王羲之“抗怀物外”，饱经篡乱，而为文平淡，这样的文章，也是新的特点。

在这以下的几个世代，易代更为频繁，文人更无“特操”，思想更加“通脱”，为文也更不拘忌。有的文章甚至“不阡不陌”，“不文不句”（张融：《门律自序》）。再加上这时出现了几个“文雅的庸主”和一帮“柔媚的词臣”（鲁迅语），为文更趋偶俪，终于形成了骈体。这样的文章，刘师培以为“禹域所独然，殊方所未有”，是最能体现汉语文章之特色的。

但与此同时，南北文章，也非一律。南方多尚辞采，北方则尚征实。《北史·文苑传》说“江左宫商发越，贵于清绮；河朔词义贞刚，重乎气质”。虽不尽然，大体如此。

再到隋唐五代，又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。这时物极而返，文章又由骈趋散。

隋时黜文尚质，唐初研雕为朴，广开才路，广开言路。这对文章的发展变化，影响甚大。魏徵诸人的直言极谏，已经不同于

六朝之文。四杰行文，虽仍骈体，而书生意气，也不同于六朝词臣。当然，唐代文章的更大变化，是当开元盛世转入衰世之时，李华、萧颖士、元结、独孤及等人，都已感到“世教沦替”，为文“救时劝俗”，“立宪诫世”。

这时文风复古，已成一种趋势。萧颖士说：“仆生平属文，格不近俗，凡所拟议，必希古人。”（《赠韦司业书》）为文“希古”而“不近俗”，复古的倾向是明显的。但唐文真正复古，还在安史乱后。这时一些文人学者，不仅为文忧世，而且颇思兴利除弊，救世济时。在永贞和会昌两次朝政改革期间，柳宗元、刘禹锡、韩愈、李翱、皇甫湜以及孙樵、杜牧、李德裕等，所为文章，都是干预时政、积极用世的。

但朝政改革连续失败，为文论政，也无力救弊起衰。这时的文章，便不仅指陈时弊，而是进而批评君权专制。从刘蜕、皮日休，到陆龟蒙、罗隐，写了更多的杂文小品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者是罗隐。鲁迅说：“罗隐的《谗书》，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。”批判的内容极为广泛。这是唐代散文崭新的特点。

下至五代，军阀割据，四民皆商，文化扫地。但在军阀的幕下，也产生了一些卑弱的骈俪文字。世积乱离，而文尚骈体，也值得注意。

宋辽金元，是“古文运动”延续转变的一个历史阶段。

经过唐末五代之乱，宋时又归一统。宋初广开才路，广开言路，超过唐代。而且太祖以武臣而得帝位，特别裁抑武臣而优遇文人，于是便有更多的文人得以入仕。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之下，文人参政，十分积极。尤其是当庆历新政和熙宁新法时期，许多文人学者如欧阳修、王安石以及苏氏父子，都是参与了朝政改革的。所谓宋代的“古文运动”，也如唐代，是同朝政改革密切相关的。这时的古文作者，不仅写了大量的论政之文，而且针对当时军事失利，也写了大量的论兵之文。这是前代不曾有的。唐代的古文

家以谈兵著称者，只有一个杜牧，而宋代则从尹洙、苏洵，到南宋的辛弃疾等，都有专门谈兵的论文。

还有，宋时国家虽不富强，而文人待遇比较优厚，法网宽松，思想比较自由，生活情趣也比较广泛。这时的文章作者，往往兼擅诗词、书法和绘画，亦或兼擅经学、史学、金石之学。所写的文章，也有新的特色。

当然，到了南宋，理学流行，这对文章也有影响，所谓“理学腐语”，也是一代“文弊”。但南宋偏安，国家多难，救亡图存，仍多慷慨论事之文。

辽、金两国，与宋并立，两国文章，都受宋文影响。理学影响尤为明显。王恽挽刘祁诗云：“道从伊洛传心事，文擅韩欧振古风。”既说出了金文的特点，也包括了辽文的特点。下至元代，也不例外。可以说，元代之文，既继承了唐宋的文统，又继承了宋儒的道统。这样的文章，又有新的时代特征。

明代之文，初继宋元，后则多变，是文风多变的一个历史阶段。

《明史·文苑传》说：“明初文学之士，承元季虞、柳、黄、吴之后，师友研习，学有本源。”这里盖指宋濂、王祎诸人。其实，不仅明初如此，此后“台阁”之文，也是上承元代的“治世之音”。文统和道统，大体相同。

明文之变，是从“七子”开始的。七子倡言“文必秦汉”，一向受人非议，其实文风复古，实亦出于不满现实。为文复古，不免泥古；但语及时事，亦慷慨之至。前后七子，无不如此。

明文更大变化，始于公安袁氏。其先行者，还有李贽。从李贽等人开始的新的文风，首先是打破了“伊洛”的道统。这在当时，也是突破了官方哲学的传统。李贽之讲“童心”，公安之讲“性灵”，所为文章，都有崭新的思想特征。

明代的社会，变化也大。天子从极权专制，到不亲政事，政

事由宦官独揽到内阁专权，再加上西北边患，东南倭患，内外交困。中叶以后，又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，城镇生活的变化，世风、士风都有变化。这对文章的影响甚大。此时小品文章的大量涌现，都与社会的变动有关。

到了明之季世，文人学者又有所“反思”，有人曾将社会危机，归罪于狂人李贽。欲挽明社之亡，乃求助于伦理纲常。于是宋儒理学，又被崇尚。这时为文，又讲经世致用，与公安、竟陵有所不同。

清初学者之文，也是主张经世致用的。这样的文章，主要产生于明清之际。在大清王朝稳定了中原地区之后，出现了三代“太平盛世”，这时一面开科取士，一面实行文化专制，文章的发展变化也面临新的形势。从康熙到乾隆，都是“太平天子”，文化水平甚高，文化政策亦高，其影响文章的发展，前代帝王有所不及。在他们的统治之下，产生了历时甚久的桐城派的“盛世之文”，这是前世少有的。

桐城派的“盛世之文”，是和清代的“太平盛世”相终始的。到了晚清末世，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，文章也面临巨大变革的前夕。从鸦片战争前后，到辛亥革命前后，文章出现了新体。再到“五四”运动前后，文章的巨大变化，更是史无前例的。

这部《历代散文选注》，始于先秦，迄于“五四”之前，历代散文的发展、演变和特点，从中可以概见。本文所谈者，只是一个轮廓，至于每个历史阶段作家作品的具体特点，已见于各本的前言，这里不再多谈。

一九九七年早春于北京

# 前　　言

宋代散文流传至今的作家之多、作品之丰，有过于唐代。这固然与活字印刷的出现，“书籍刊行大备，要自宋开始”（《钦定天禄琳琅书目》）有关，但其成就可并唐而无愧，毋容置疑。世称古文有“唐宋八大家”，宋占其六，是其证。宋代散文，无论是内容，还是风格，较之唐代，都自有特色。

## 一、宋代文章的特色

就思想内容而言，宋文多政论，有很强的时代性；多讲学言道之文，有很强的哲学性；多以记录见闻为内容的笔记之文，真实而兼具趣味性和学术性。从艺术上看，宋文长于议论，风格平易自然。而这些特色的形成，又无不受到宋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。

有宋一代，政局存在三大特点，一是国家机器始终庞大不堪，冗官、冗兵、冗费始终困扰朝廷。鉴于晚唐五代武将篡弑不绝的史实，篡周建宋的宋太祖赵匡胤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，“艺祖革命，首用文吏，而夺武臣之权”便是其中之一。“宋之尚文，端本乎此。”（《宋史·文苑传》）宋代开科取士，广开才路，“选人之精，得人之多，进人之速，用人之尽，实为希阔殊尤，旷绝盛事。”（石介《庆历圣德颂序》）为唐所不及。由于“给赐优裕，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，各自勉其治行。”（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卷二十五《宋制禄之厚》）因而宋人文章虽有贬谪摧抑之词，却很少怀才不遇之作。宋代文人，往往集文士、学者、官吏于一身，“名臣辈出”，形成学术繁荣的景象。唐代文人，虽有诗文兼擅者，但又兼擅书画音乐者不多，再并通经学史学者则凤毛麟角。而宋代兼擅博通者却不乏其人。欧阳修、司马光都是煌煌史著的

编撰者，王安石则是别具卓识的经学家，苏轼的才气学问，风流倜傥，并世无二。于是崇尚才学，成为宋代文人的重要士风，论学之作、讲道之文、书画品评题跋，层出不穷，宋文的考据之风、书卷之气颇浓。

宋代政局的特点之二是国家始终积贫积弱：北宋有辽金之患，南宋有金元之扰。在对外战争中，宋朝多半处于劣势，并先后造成北宋、南宋之灭亡。政局特点之三是国家政权始终纷争不已。主要表现为北宋朝的改革与保守之争，南宋朝的和战之争。宋代作家几乎全都卷入其中，或致力于改革（如范仲淹、欧阳修、王安石），或效命于疆场（如陆游、辛弃疾），或擘画国是（如李纲、胡铨），或指陈时弊（如陈东、陈亮）。他们大多来自社会下层，熟悉民间，关切现实，绝少隐遁。欧阳修谓“某尝再为县令，然遂得周达民事，兼知宦情”。（《与焦殿丞书》）这在宋代文人中有相当代表性。故发而为文，则内容多言政论兵之作，表现手法上以好议论、善驳辩见长。而宋代统治者广开言路，太祖曾立“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”的“戒碑”（《宋稗类钞》卷一），则从行政立法的角度，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上面大开言路，下面也就大放厥词，在文人学者中，好发议论，也就蔚为风气。论政、议兵、讲学、鸣道，成了宋代文章的重要内容，议论文之多，超过战国以来的任何时代。像欧阳修的《与高司谏书》、王安石的《答司马谏议书》，都是围绕着庆历、熙宁年间改革与保守的斗争而展开的论战。李纲的《论国是》、胡铨的《戊午上高宗封事》都是力斥议和，坚主抗金的，极富现实性和战斗性。以论兵之作而言，唐代以言兵著称者，仅杜牧一人而已。而在宋代，从尹洙、尹源开始，到梅尧臣、苏洵、欧阳修、苏轼，再到辛弃疾、陈亮，都有论兵之作。有感于宋代积贫积弱的现状，宋代文人或感慨国力不振，或图谋富国强兵，或哀惋亡国之痛，或抒发报国之情，或歌颂英雄功业，或抨击卖国劣迹，如

宗泽的《乞毋割地与金人疏》、岳飞的《乞出师札》、《五岳祠盟记》、虞光文的《论今日可战之机有九疏》、陆游的《姚平仲传》、辛弃疾的《祭陈同甫文》、陆秀夫的《拟景炎皇帝遗诏》、文天祥的《〈指南录〉后序》等等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宋代尤其是南宋文章内容的一大特色。只是由于积贫积弱的国力所造的心理阴影，使宋人文章的议论，纵横之气、凌厉之势，往往不如唐人。

宋文多讲学鸣道之作，这与宋代的哲学及哲学界的论章有关。儒学对唐代文人的影响主要是经世致用，注重事功。唐代文人很少就经学撰论著述。而儒学发展到宋代，已由汉代的章句之学变成义理之学，称为“理学”。宋之理学分濂（周敦颐）、洛（二程）、关（张载）、闽（朱熹）四派。他们纷纷著书立说，互相驳难辩论。如王安石出于变法的需要，对传统的经学作出了新解，一时号为“新学”。如朱熹与陆九渊的“天理”与“人心”之争，陈亮、叶适的“功利之学”与朱熹的“性命义理之学”之争。因而宋代的讲学鸣道之文从柳开、石介开始，一直延续到宋末，风行一世。宋代道学派别甚多，而道学家论文都有重道轻文的共同特点。道学主张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，扼杀了作者的真性情，使宋代的一些文章多了些陈腐的说教和头巾气。这是宋代的抒情散文不太发达的原因之一，也是南宋后期散文骨弱气萎的原因之一。

宋代散文好议论、善驳难的特点，不仅表现在奏疏、论说等文体中，也体现在亭院记、游记、辞赋、赠序、题跋等文体中。如王安石的《游褒禅山记》略于记游，详于议论，借题发挥，议事论学，深寓哲理。苏轼的《石钟山记》，记游之外，考据议论，笔下生风。辛弃疾的《跋绍兴辛巳亲征诏草》仅寥寥数十字，却总结了国家兴亡的重大教训，也倾注了作者对坐失恢复良机的一腔忠愤和无限感慨。

宋代文章，内容多言政论兵之作，表现手法上以好议论、善

驳辩见长，风格上则以平易自然为基本特色。宋初，曾用行政手段在诗文创作中倡导过这种风格。如《宋朝事实类苑》卷三十七载：“真宗深究诗雅，时方竞务西昆体，磔袭雕篆，亲以御笔选其平淡者。”《宋人轶事汇编》卷九载：“至和、嘉祐间，场屋举子为文奇涩，读或不能成句，欧公力欲革其弊，既知贡举，凡文涉雕刻者，皆黜之。”这对扭转宋初雕琢奇涩的文风无疑起了一定的作用。宋代重要的作家几乎都提倡平淡自然的风格，并在创作中努力实践之。如王禹偁认为文“既不得已而为之，又欲乎句之难道邪？又欲乎义之难晓邪？”（《答张扶书》）他的散文以“简雅古淡”（叶适《习学记言序目》卷四十七）。欧阳修主张诗文“除去文饰，归彼淳朴”，（《研雕为朴赋》）反对“好新奇以自异，欲以怪而取名”。（《跋唐韦维善论政》）他的文章也以“纡余委备，往复百折，而条达疏畅，无所间断”（苏洵《上欧阳内翰第一书》）的风格为一代师范。苏轼认为文章“渐老渐熟，乃造平淡，其实不是平淡，绚烂之至也”。（《与二郎侄儿书》）他的文章如行云流水，“常行于所当行，常止于不可不止”。（《文说》）当然，在平易自然的共性风格特征之中，宋代作家也注重对多种风格的开拓和创作，各具艺术个性。如王禹偁文的“简雅古淡”与欧阳修文的委婉曲折与苏轼之文的通脱晓畅、滔滔汩汩，可谓姿态各异。

## 二、宋代文章的发展轨迹

有宋一代，享祚几近三百年，其间文章颇有变化。北宋之文，大体可分为四期。

第一期是宋初从太祖到真宗的五六十年间，是宋代四六时文的极盛时期。文章格调，沿袭五代词臣的余绪。“是时，天下学者杨（亿）、刘（筠）之作，号为时文。能者取科第，擅名声，以夸荣当世，未尝有道韩文者。”（欧阳修《记旧本韩文后》）这是符合当时文恬武嬉的政治需要的。其间有柳开、穆修、王禹偁等先后倡导“古道”、“古文”，力诋时文。《宋史·尹洙传》称：“自唐末

五代，文体卑弱，至宋初，柳开始为古文。”但柳开、穆修所为古文，矫枉过正，以“断散拙鄙为高”。而王禹偁之文，不仅“全变五季雕绘之习”，“亦不为柳开之奇僻”。（《四库简明目录》卷十五）因而禹偁成为宋代古文运动真正的先行者。尽管在他的有生之年及身后的一段时期，他的言事论政之文不受重视，但不久就受到欧阳修、苏轼等人的盛赞。

第二期是庆历新政前后的二三十年间。其间朝改革的中心人物是范仲淹，“古文运动”的中心人物则是欧阳修。他一方面写出了“众莫能及”的范文；另一方面选拔和成就了一批堪为后继的人才。与此同时，他还力倡平淡自然的文风、学风，反对险怪。宋代“文风一变”，始自欧公：“景祐初，公与尹师鲁专以古文相尚，而公得之自然，非学所至。超然独骛，众莫能及。譬夫天地之妙，造化万物，动者植者，无细与大，不见痕迹，各极其工，于是文风一变，时人竞为模范。”（韩琦《欧阳公墓志铭》）当时作者辈出，石介、尹洙、苏舜钦、苏洵、韩琦、富弼、刘祁、刘敞等都有大量语切时弊、不为空言的言事论政之作。由于军事是朝政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，所以尤多谈兵之作。

第三期是熙宁变法前后。这一时期朝政改革的中心人物是王安石，而文章最有影响的则数苏轼。苏轼“性不节语言，与人无亲疏，辄输写腑脏；有所不尽，如茹物不下，必吐出乃已。”（《密州倅厅题名记》）发而为文，直抒胸臆，一泻无余。他的文章，自然而有情韵，平淡而出新奇，雄浑而善雅谑，较之欧文更具个性而有所发展。王安石不以能文自居，却“好使人同己”。他的文章独抒己见，不为架空之谈，如老吏断狱，毫无枝蔓。其他重要作者有苏辙、曾巩、司马光等。此外尚有一批学者，如周敦颐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，也写了不少论事之文。由于他们倡言重道轻文，对后来的“以语录为文”不无影响。

第四期是北宋末年。国事日败，文章也盛极而衰。苏轼把

“复兴斯文”的希望寄托在黄庭坚、秦观、晁补之几人身上。他们几人都是多才多艺的作者，然文名往往为诗名、词名所掩。其实他们在绍圣年间，多因党狱而遭打击，形于文章，也多慷慨之辞。不过其造诣，远逊于欧苏。

南宋之文，大致也可分为四个时期。第一期为两宋之交，南宋之初，是宋文发展的新时期。金人南侵，宋帝“北狩”，贵族平民均遭浩劫。国难临头，几乎人人言事论政，同仇敌忾，成为社会风气，宋人好发议论的传统大为发扬。很多不以文名的作者如宗泽、李光、赵鼎、胡铨、李纲等，都写出了言事论政之文。就连周程一派的讲学家，也不仅言心说性，还写了不少抗金救亡的文章。这类文章作者之多，史无前例。此外，这一时期还产生了一批纪实之文，仅存于《三朝北盟汇编》者就不下百种。举凡贵族蒙尘、人民遭难都实录其中。

第二期为南宋中期。偏安之局已定，适应统治者宴安的需要，产生了“纤巧摘裂”之文。“绍兴中，有贵人好为俳谐体诗及笺启……《上汪内相启》云：‘长楸脱却青罗帔，绿盖千层；俊鹰解下绿丝绦，青云万里。’后生遂有以为工者。”（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卷五）尽管如此，抗战的思想，依然存在；言事论政之文，仍是主流。特别是孝宗乾道、淳熙年间，范成大、杨万里、陆游、辛弃疾、周必大、楼钥、朱熹、陆九渊，以及稍后的真德秀、魏了翁等，都写了大量的言事论政之文，陈亮之论列古今，指陈时弊，辛弃疾之议政议兵，剖析利害，滔滔汩汩，极有特色，堪称一代鸿文。

第三期为乾道、淳熙之后。韩侂胄、史弥远先后专政，朝政日非，文禁渐严，文章亦入衰世。尤其是理宗、度宗朝，场屋之文和道学影响颇大，“奇诡浮艳”之文得行于时，“以语录为文”也以此时为最。真可谓“国家将亡，必出妖孽”了。

第四期是南宋末年，宋元之交。山河破碎，社稷倾覆，生民

涂炭。涌现了一批殉国志士之文和易代遗民之文。前者有陆秀夫、文天祥、谢枋得等，后者有王炎午、林景熙、郑思肖、谢翱和邓牧等，所为之文，充满亡国之痛，黍离之悲，又不同于南北宋之际的文章。其中邓牧的《伯牙琴》，不同于文、谢诸公的忠君恋主之文，而是抨击暴政，指切近事，见解尤深，忧愤更广。

### 三、辽金的散文创作

辽金是先后与宋朝并世而立的两个国家。两国各有文字，也都时行汉文，学术文化都深受宋朝影响，文章自不例外。

辽太祖曾亲谒孔子庙。其后，景宗、圣宗、道宗均尚文雅，对汉文的经史文集多有翻译。从现存的《全辽文》看，所受宋朝儒学的影响不小，其中的诏谕、章奏、记序、志铭，道学气甚浓。不仅由宋入辽的作者如此，辽国本土的作者亦复如此。

陈述的《全辽文序例》云：“契丹建国之初，以鞍马为家，太祖阿保机经略方内，未遑艺文之事；逮东丹王监抚东藩，始好典册。德光入汴，取晋图书礼器而北，制作渐修。至圣宗与宋盟好，科目日隆，雅辞相尚，一时以文学名者，如王鼎、张俭、萧韩家奴、耶律孟简之流，斐然成章。惜辽国书禁甚严，传入中土者，法至死。道宗清宁末，又禁刊文字，故流传者无多。复以亡国于女真，五京兵燹，典籍佚散。”

由是而言，辽代文章，难窥全豹。然就现存于《全辽文》者观之，辽国帝王相臣，多好词翰，或擅古文，或工四六。如萧韩家奴的《对答制问》，揭露了“比年以来，群黎凋弊，利于剽窃，良民往往化为凶暴”的现实。针对“盜贼之害，何可以止”的制问，提出“轻徭省役，使民务农。衣食既足，安习教化，而重犯法，则民趋礼义，刑罚罕用矣”的答策。其思想和文风均受汉族文化的影响。而辽之后妃，善诗能文，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，是个十分突出的现象。以懿德皇后萧观音为例，所作《十香词》“怨而不怒，深得词家含蓄之意。”（徐轨《词苑丛谈》）《谏猎》一疏，

“词意并茂”，（吴梅《辽金元文学史》）也是传世之作。

金源一代，文章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。

金初文化落后，自己无文，借才异代：“金初无文字也，自太祖得辽人韩昉而言始文。太宗入宋汴州，取经籍图书；宋宇文虚中、张斛、苏松年、高士谈辈先后归之，而文字猥兴，然犹借才异代也。”（庄仲方《金文雅序》）这一时期作品存者甚少，无足称者。

第二期为世宗、章宗的大定、明昌年间。以儒学为治，以科举取士，培育了一批金源自己的作者。代表作者有“以文章政事显”（《中州集·王寂小传》）的王寂，和“以高文大册，主盟一时”（《金史·党怀英传》）的党怀英。二人都是盛世的作者。王寂曾遭贬谪，颇有几篇牢骚不平之文，如《三友轩记》，自称“心如坚石，形如槁木”，俨然物我两忘，鄙弃得失。然一朝奉诏回朝，又作文感恩戴德不迭。这种心态，此等文章，在当时颇具代表性。

第三期为贞祐南渡前后。国家跌入衰世，文章却进入盛世。代表作家有赵秉文、杨云翼、王若虚、元好问等人。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思想受宋儒熏染甚深，为文都学欧苏，平易自然，无所雕饰，兴之所至，纵意信笔。其中成就最高的当数元好问。他的文章长于叙事，不擅于写景说理。如他的《市隐斋记》，虽是应酬文字，却不作违心之谈。有所讥讽，却不大声色，相当委婉，而且颇有分寸。所发议论，也有深度。他的《送秦中诸人引》，以清新流畅的文笔，赞美了关中的风土人情，表达了对山川胜概、田园生活的不胜向往和对“美食大官”、“高赀华屋”的鄙薄。在金源各家的作品中堪称佳作。

#### 四、元代的散文创作

蒙元以武力建国，但天下可在马上得之，却不能在马上治之。世祖灭金侵宋之际以及一统天下之后，都曾先后派人寻访并网罗了一批中原的儒者文人。宋儒赵复即是由姚枢寻得的传授理学的

重要人物之一。因此元代文人，实多儒者，一代文章，儒风甚盛。“道从伊洛传心事，文擅韩欧振古风”（王恽《挽诗》），元代散文的思想不出濂洛关闽，其文风特点，不外典雅醇正。

当然这也只是概而言之。其实，元代历时百年，作家人杂金宋，地兼南北，其间每个时期、每个作家也都有各自的特点。就文章的变迁而言，元文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：

“大凡《国朝文类》，合金人、江左，以考国初之作；述至元、大德，以观其成；定延祐以来，以彰其盛。”（王理《元文类序》）就作者而言，略可分为三辈：前辈作者有许衡、郝经、王恽等；稍后有姚燧、戴表元、刘因、吴澄、赵孟頫等；晚辈作者有虞集、欧阳玄、揭傒斯、宋本、黄溍、柳贯、吴莱等。此外还有卢挚、马祖常、袁桷等均名负一时，可见元代文章作者辈出。

元朝为蒙元入主中原，民族矛盾始终较为突出。元代作者如何根据理学原则处理顺逆出处问题的，兹举几个有代表性的作者、作品以资参考。如姚燧的《序江汉先生死生》，于最难落笔之处，写得相当曲折，极为得体。赵复本是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作者却赞誉其能使儒者不坠其绪的功绩，以“士为知己者生”美化之。这既是元儒的新创造，也是元文的新特点。如刘因是宋之遗民，受程朱道学影响较深，入元也曾一度作官，后以母疾辞，屡征不起。他的《上宰相书》极力自贬，请求宰相“俯加矜悯，曲加保全”。可谓善于辞令。在《辋川图记》中，他引述程朱之说，切责王维，行文于“春容”、“醇正”之外，还有些慷慨激昂。又如赵孟頫，是赵宋宗室，诗文书画，无不擅长；又通声律，精鉴赏，是个多才多艺的文人。被荐入朝后，既颇得天子赏识，又颇受朝臣猜忌，故内心十分矛盾。为远害避祸，屡次自请外任。所作《五柳先生传论》称颂陶渊明，表明志在高举；但既已出仕，则悔之晚矣。他的《夷斋说》就“夷”字借题发挥，大谈仕途险恶、人心险恶，是深有体会之论，行文也时有愤辞。这种心态在当时由宋仕元的文